

武占江 著

刘光黄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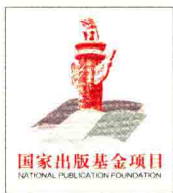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系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学术研究系列

刘光蕡评传

武占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光贇评传/武占江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2

(关学文库/刘学智, 方光华主编)

ISBN 978-7-5604-3540-4

I. ①刘… II. ①武… III. ①刘光贇(1843 ~ 1903) —评传 IV. ①K8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447 号

本书受河北经贸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出品人 徐 晔 马 来

篆 刻 路毓贤

出版统筹 张 萍 何惠昂

刘光贇评传 武占江 著

责任编辑 王学群 装帧设计 泽 海

版式统筹 刘 争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E - mail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540-4

定 价 52.00 元

《关学文库》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赵正永

副 主 任 江泽林 王莉霞 张岂之 陈国强 张祖培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上官吉庆 马 来 王 勇 王莉霞

王景安 方光华 权 俭 刘学智 江泽林

李 浩 李明远 张小宁 张岂之 张社年

张祖培 陆柯仑 陈国强 岳 亮 赵正永

赵馥洁 姜 锋 桂维民 徐 晔 郭大为

郭立宏 阎晓宏 彭树智 董 军 薛保勤

《关学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 主 任 张岂之
- 副 主 任 赵馥洁 薛保勤
-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马 来
- 总 主 编 刘学智 方光华
-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马 来 王美凤 方光华 米文科 许 宁
- 孙学功 刘学智 杨建辉 李似珍 李颖科
- 何惠昂 张 波 张 萍 张 雄 张世民
- 张岂之 陈战峰 林乐昌 赵瑞民 赵馥洁
- 郝润华 袁志伟 徐 晔 高彦平 郭文镐
- 曹树明 韩 星 路毓贤 薛保勤 魏 冬

总序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宋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张载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时官至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死后赠司空。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时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迪死后,张载与全家遂侨居于凤翔府郿县横渠镇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讲学,世称“横渠先生”。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横渠之学”,他所代表的学派被后人称为“关学”。张载与程颢、程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可以说,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的地域性理学学派,亦称关中理学。

关学基本文献整理与相关研究不仅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也是体现中国思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举措。《关学文库》以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为宗旨,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开拓性为特点,是我国第一部对上起于北宋、下迄于清末民初,绵延八百余年的关中理学的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这项重点文化工程的完成,对于完整呈现关学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彰显关学精神,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关学文库》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仅就关学、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关学的思想特质、《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等谈几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一、作为理学重要构成部分的关学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形态与新阶段,一般被称为新儒学。但在新儒学中,构成较为复杂。比较典型的则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南宋学者吕本中较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关学是作为理学的重要一支来

作介绍的。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祚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其中虽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们的思想内涵及其影响并不限于某个地域,而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即宋代理学。

根据洛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以及闽学代表人物朱熹对记载关学思想的理解、评价和吸收,张载创始的关学本质上当是理学,而且是影响全国的思想文化学派。过去,我们在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学史》上册的时候,在关学学术旨归和历史作用上曾作过探讨,但是也不能不顾及古代学术史考镜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张载后学,如蓝田吕氏等,在张载去世后多归二程门下,如果拘泥门户之见,似乎张载关学发展有所中断,但学术思想的传承往往较学者的理解和判断复杂得多。关学,如同其他学术形态一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的形态。关学没有中断过,它不断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明清时期,关学的学术基本是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及与张载关学的融会过程。因此,由宋至清的关学,实际是中国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它开启了清初王船山学术的先河。

《关学文库》所遴选的作品与人物,结合学术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关学编》及《关学续编》《关学宗传》等,均是关中理学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张载,下至晚清的刘光蕡、民国时期的牛兆濂,能够反映关中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学术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历史上的《关中丛书》相比,这套文库更加丰富醇纯,是对前贤整理文献思想与实践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二、张载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

佛教传入中土后,有所谓“三教合一”说,主张儒、道、释融合渗透,或称三教“会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并举的文化现象。当历史演进到北宋时期,由于书院建立,学术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学人的独立思考,使他们对儒家经学笺注主义提出了怀疑,呼唤新思想的出现,于是理学应时而生。理学主体是儒学,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将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理学产生时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学学派。

比如,在“三教融合”过程中,如何理解“气”与“理”(理的问题是回避不开的,华严宗的“事理说”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响)的关系?理学如何捍卫儒学早期关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观点,又不致只在“善”与“恶”的对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与社会及个人有何关系?君子、士大夫怎么做才能维护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又能坚持修齐治平的准则?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中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宋代理学的产生及不同学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写照,因而理学在实质上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时朱熹闽学各有自己的特色。作为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张载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抱负,在对儒学学说进行传承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北宋时期,学者们重视对《易》的研究。《易》富于哲理性,他通过对《易》的解说,阐述对宇宙和人生的见解,积极发挥《四书》义理,并融合佛、道,将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载与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等人曾有过密切的学术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学术思想上相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张载来到京师汴京,讲授《易》学,曾与程颢一起终日切磋学术,探讨学问(参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张载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为二程表叔,二程对张载的人品和学术非常敬重。通过与二程的切磋与交流,张载对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充满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因为张载与程颢、程颐之间为亲属关系,在学术上有密切的交往,关学后传不拘门户,如吕氏三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在张载去世后一些人投到二程门下,继续研究学术,也因此关学的学术地位在学术史上常常有意无意地受到贬低甚至质疑(包括程门弟子的贬低和质疑)。事实上,在理学发展史上,张载以其关学卓然成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理论建树,这是不能否定的。反过来,张载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也影响了二程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程朱学说及闽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张载依据《易》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在基本点上和《易》的原有内

容并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认为没有超越“气”之上的“太极”或“理”世界,换言之,“气”不是被人创造出的产物。又由此推论出天下万物由“气”聚而成;物毁气散,复归于虚空(或“太虚”)。在气聚、气散即物成物毁的运行过程中,才显示出事物的条理性。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这个观点去看万物的成毁。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间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处于宇宙之中。由于三者都是气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归根到底,万物与人类的本性是一致的。进而认为,人们“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里所表述的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与张载有别,他们通过对张载气本论的取舍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关思想,建构了“万理归于一理”的理论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二程在张载人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论。二程赞同张载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但二程认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瑕的;“气质之性”是气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气禀决定,禀清气则为善,禀浊气则为恶,正因为气质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气”的侵蚀而出现“气之偏”,因而具有恶的因素。在二程看来,善与恶的对立,实际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朱熹将张载气本论进行改造,把有关“气”的学说纳入他的天理论体系中。朱熹接受“气”生万物的思想,但与张载的气本论不同,朱熹不再将“理”看成是“气”的属性,而是“气”的本原。天理与万事万物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朱熹关于“理一分殊”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又说:“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论包括一理摄万理与万理归一理两个方面,这与张载思想有别。

总之,宋明理学反映出儒、道、释三者融合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于两宋时期。张载开创的关学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之学继承发扬了张载学说,又有新的创造。

三、关学的特色

关学既有深邃的理论,又重视实用。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风笃实,注重践履。黄宗羲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明儒学案·师说》)躬行礼教,学风朴质是关学的显著特征。受张载的影响,其弟子蓝田“三吕”也“务为实践之学,取古礼,绎其义,陈其数,而力行之”(《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特别是吕大临。明代吕柟其行亦“一准之以礼”(《关学编》)。即使清代的关学学者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依然守礼不辍。

其次,崇尚气节,敦善厚行。关学学者大都注意砥砺操行,敦厚士风,具有不阿权贵、不苟于世的特点。张载曾两次被荐入京,但当发现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毅然辞官,回归乡里,教授弟子。明代杨爵、吕柟、冯从吾等均敢于仗义执言,即使触犯龙颜,被判入狱,依旧不改初衷,体现了大义凛然的独立人格和卓异的精神风貌。清代关学大儒李颀,在皇权面前铮铮铁骨,操志高洁。这些关学学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体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

最后,求真求实,开放会通。关学学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较宽广的学术胸怀。张载善于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儒学理论。他注意对物理、气象、生物等自然现象做客观的观察和合理的解释,具有科学精神。后世关学学者韩邦奇、王徵等都重视自然科学。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经典,强调用心求学,求其“放心”,用心考证,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独立主见的治国理政观念。关学学者坚持传统,但并不拘泥传统,能够因时而化,不断地融合会通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由张载到“三吕”、吕柟、冯从吾、李颀等,这种融会贯通的学术精神得到不断承传和弘扬。

四、《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

关学文献遗存丰厚,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泾野先生五经说》《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收入《四库全书》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在大陆已成孤本(如韩邦奇的《禹贡详略》、李因笃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残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残本,现重庆图书馆存有原书,国家图书馆仅存胶片;收入的南大吉诗文,搜自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周雅续》)。即使晚近的刘光蕡、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传亦稀世罕见。民国时期曾有宋联奎主持编纂《关中丛书》(邵力子题名),但该丛书所收书籍涉及关中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驳杂,基本上不能算是关学学术视野的文献整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将《张载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关学编(附续编)》《泾野子内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学丛书》陆续出版,这些仅是关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文献仍系空白。

关学典籍的收集与整理,是关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整理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关学研究的深入和关学精神的弘扬,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掘。

现在将要出版的《关学文库》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共40种,47册,约2300余万字。

一是文献整理类,即对关学史上重要文献进行搜集、抢救和整理(标点、校勘),其中涉及关学重要学人29人,编订文献26部。这些文献分别是:《张子全书》《蓝田吕氏集》《李复集》《元代关学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张舜典集》《马理集》《吕柟集·泾野经学文集》《吕柟集·泾野子内篇》《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韩邦奇集》《南大吉集》《杨爵集》《冯从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颀集》《李柏集》《李因笃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贺瑞麟集》《刘光蕡集》《牛兆濂集》以及《关学史文献辑校》。

二是学术研究类,其中一些以“评传”或年谱的形式,对关学重要学人进行个案研究,主要涉及眉县张载、蓝田吕大临、高陵吕柟、长安冯从吾、朝邑韩邦奇、周至李颀、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户县王心敬、咸阳刘光蕡等学人,共11部。它们分别是:《张载思想研究》《张载年谱》《吕大临评传》《吕柟评传》

《韩邦奇评传》《冯从吾评传》《李颀评传》《李柏评传》《李因笃评传》《王心敬评传》《刘光蕡评传》等。此外,针对关学的主要理论问题与思想学术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共3部。这些著作分别是:《关学精神论》《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等。

在这两部分内容中,文献整理是文库的重点内容和主体部分。

《关学文库》系“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文库的组织、编辑、审定和出版工作在组织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负责。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对这一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国家和省级重大文化精品图书高度重视,亲自担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自始至终关心支持文库的编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副省长王莉霞和省政府秘书长陈国强等对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原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薛保勤,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赵馥洁,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主任张祖培对文库的策划与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库历时五年编撰完成,凝结着全体参与者的智慧和心血。总主编刘学智、方光华教授,项目总负责徐晔、马来同志统筹全书,精心组织,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十余所院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协力攻关,精益求精,体现出深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他们孜孜矻矻,持之以恒,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以古人为己之学相互勉励,在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的同时,不断锤炼学识,砥砺德行,努力追求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学术品格。出版社组织专业编辑、外审专家通力合作,希望尽最大可能提高该文库的学术品质。作为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我谨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等原因,文库书稿中的疏漏差错难以完全避免。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加以批评指正,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努力使该文库更加完善。

张岂之

2015年1月8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提起李岳瑞、于右任、张季鸾，近代史学界可谓无人不知，而对他们的老师刘古愚（名光贲，晚年自号古愚，以号行世）知道的恐怕就很少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刘古愚和他的著作《学记臆解》，为梁启超此书作注解的人亦不知刘古愚何许人也，与这些闻人弟子相比，刘古愚身后甚为寥落。长期以来，他的名声与他的贡献不太相称。刘古愚一生的事业在西北，他是西北地区走向近代化的启蒙者、伟大的教育家，更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把满腔的热血都播撒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他的老师刘古愚“至诚济世，忘家与身”，“卒殉其事以终”，这绝无过誉之处。其实，刘古愚晚年在西北确有赫赫之名，被誉为关中大儒、关学后劲（梁启超语）、经学领袖（于右任语）。他直接发起了西北地区的维新运动，其思想影响了辛亥革命一代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多受其思想的哺育；他深深地为该地区埋下了文明的火种，他的功业与事迹曾经长期在关中老百姓中口耳相传。他的活动还受到外国传教士的注意，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刊文介绍了刘古愚的活动（1896年），并对刘古愚的思想进行了评述。20世纪20年代，刘古愚遗著出版的时候，康有为、陈三立、李岳瑞、张季鸾等都曾为刘古愚的著作作序或跋，对刘古愚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在风雷激荡的岁月中，他的身影逐渐为尘封的历史所遮盖，提到他的人越来越少，即便如此，只要对陕甘近代历史进行总结，刘古愚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先是在陕西本地，研究者的目光再次投射到刘古愚的身上，陕西学界整理出版了刘古愚弟子张鹏一1939年写成的《刘古愚年谱》，编辑排印了《刘古愚教育文选》，并有一批研究论文面世，刘古愚作为一位教育家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由于他在近代文化史上多方面的贡献，许多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再次与刘古愚迎面相遇，他开始由一个“地域性人物”向“全国性人物”转化。刘古愚受到全国学界的关注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实现的。

第一,学者在探索近代新思想传播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刘古愚。“进化论”是在近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思想,而严复《天演论》第一个刊印本就是在刘古愚主持的味经书院刊书处诞生的,要研究《天演论》及严复思想的演变历程,“味经本”《天演论》至关重要:它是未经严复修改的版本,与此后众多的版本有着很大的不同。1981年,邬国义先生首先对“味经本”《天演论》的刊发时间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味经本”《天演论》不是如封面上所标注的出版于1895年,因为书中出现了“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的字样。邬国义的说法引起学界的关注,汤志钧先生对“味经本”《天演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天演论》版本流传情况一时成为热点,人们由《天演论》问题开始关注到刘古愚。安徽大学王天根先生对刘古愚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活动进行了比较详细地研究和介绍,认为他是西北地区维新思潮兴起的重要推动者。

第二,在研究报刊史的过程中,学者也追溯到了刘古愚。梁经旭、张惠民等先生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们发现,陕西第一份近代性报刊是刘古愚所主持的《时务斋随录》,之后刘古愚的弟子分别创办了陕西第一份报纸,第一份研究机构的学报,刘古愚所主持的味经书院刊书处还是近代西北地区著名的出版中心,刘古愚是陕西新式新闻报刊事业的奠基人。王天根先生也对味经书院刊书处及西北地区的“维新氛围”与“媒介建构”进行了介绍,刘古愚又被看作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方面的重要人物。其实,刘古愚对中国新式新闻传播事业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贡献都是多方面的。张季鸾即深受刘古愚影响,《大公报》骨干人物王云生、曹谷冰、李侠文等提到张季鸾,都会谈到这一点。刘古愚弟子于右任所创办的《竖三民》是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的报纸;刘古愚的再传弟子吴宓、李伯虞都是现代新闻出版界的要角,吴宓为《学衡》杂志主编,李伯虞长期为上海著名大报《新闻报》主笔。

第三,学者在研究自然科学史的过程中注意到刘古愚。20世纪30年代,著名数学史专家李俨在陕西搜集数学史资料的时候就注意到刘古愚,搜集了大批刘古愚主持刊刻的数学书籍以及味经书院师生的数学著作,并对这批书籍进行了初步的介绍。2007年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韩洁在李俨先生所搜集的资料基础上,撰写了《〈味经时务斋课稿丛抄〉研究》的硕士论文,对刘古愚领导下的味经书院的数学教育以及味经书院师生的数学著作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介绍。另外,农学界对刘古愚在农学方面的贡献也进行了研究。

第四,学者在研究近代教育方面涉及到刘古愚。新加坡学者严寿澂研究蒯光典时发现,当时能够和蒯光典普及教育思想相提并论的只有刘古愚和王照,并对刘古愚的普及教育思想进行了介绍。毫无疑问,刘古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本书对他这方面的成就介绍比较详细,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刘古愚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陕西之外(梁经旭、张惠民除外)的人以前并不了解,但是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刘古愚,这说明刘古愚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突出的贡献,尘封的历史最终难掩其光辉。

1997年,笔者与任大援老师合作出版了《刘古愚评传》,对刘古愚的生平、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本次重写“评传”与点校刘古愚的著作同时进行。起初是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刘古愚先生遗书》的点校方面,至于其“评传”稍加修订、扩充就可以了。但是在点校《刘古愚先生遗书》的过程中,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想法,加之近年来学界关于刘古愚的研究又有了不少新成果,着笔之后发现已经不是修订了,完全是重写。篇幅也由20多万字扩充到40万字,从内容到视角,都有了很大调整。与原书相比,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是需要对读者交代的。

首先,乡邦贤达与地方建设者。前书《刘古愚评传》主要是运用思想史的写法,刘古愚的生平是作为其思想的背景处理的,因而在交代其主要事迹之后即着眼于其思想的介绍与分析。20年来,近代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原来的革命视角、近代化视角之外,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革命、现代化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建设方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毕竟不仅仅是精英人物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政治的发展过程,省级、县级乃至乡村社会的发展情况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而具有举人身份、五品国子监学正头衔的刘古愚就是这样一位沟通省与县乡的中间人物,他既是陕甘地区著名书院的院长,又是乡村头面人物,对地方教育、经济、社会事业有着多方面的直接贡献和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视角也更多地倾向于其社会事务方面的思想与贡献。对于刘古愚身边师友做了比较多的介绍,把刘古愚放在当时更为广阔的社会场景中,希望通过这一侧面来管窥陕甘走向近代的过程,并为乡绅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地位提供一个案例。

其次,大转折时期过渡人物的不懈探索。毫无疑问,刘古愚是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但生活在传统社会中,面对着强大的保守势力,如何说服人们打破旧局面是他一生重要的课题。对这种在传统经史文化中陶铸出来,而对西方

文化鲜有直接接触的庞大社会群体,刘古愚更多的是用传统的话语表达新的思想,这在他的思想中又体现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六经注我的方式,即用旧语言表达新内容,采取对传统经史进行新诠释的方法来表达新思想。以旧的经史研究范式来看,这是一种叛逆,是一种破坏。二是不能抛弃旧的文化符号和一些言说系统,比如五经形式上的权威,甚至没有突破“西学中源”的窠臼,主张发扬孔教,采用旧的范畴表述思想,如明德新民、经世守身,等等。从新的思想体系来看,又不免让人觉得“蹩脚”“迂腐”。但就是用这样的“旧语言”,刘古愚完成了对传统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民族思想的根本性转化,并对理学思想的许多重要方面也进行了具有转折性的新阐释。同时,他又敏感地意识到,在各种汹涌澎湃的新思潮冲击之下,传统有被全盘否定的苗头,他难以认可这种“玉石俱焚”的倾向。刘古愚犹如一个正在羽化成蝶的蛹,蝴蝶的一大半已经从蛹中化出,还有一部分在那坚硬躯壳中跃动。这是一个艰难而生动的过程:新的、旧的依然血脉相连,我们难以机械地说他的思想哪块是先进的,哪块是保守、落后的。正因为他没有完全斩断与旧思想、旧形式的联系,他保留着旧体系的精华,那种文化的断裂还不是很严重。这种情形给我们现时代的人以很大启示。我们尽量把他的思想放在新旧转折的这个大坐标、大视野中去分析,清理出他新的脉络;分析其对传统持守的意义,以反照“五四”以来我们否定了哪些不该否定的东西,今天应该再找回哪些珍贵的东西。当然,这样做很有难度,任何后人的评介都对被评介者有一定程度的遗漏,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

再次,典型的地域文化特色。国家危亡、时代的大变局,这是刘古愚与近代先进人物所面临的共同时代问题。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与世界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世界上的任何大事对中国都有影响,中国的任何重大举措,都难以忽视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能摆脱世界因素的制约和束缚。与一些近代著名思想家、改革者不同的是,刘古愚身处偏远的内地,他生平只有一次曾东出潼关,更没有出洋游历的机会,对中国以外世界的体会多是通过间接的渠道得来的。从根本上说,新思想是思想家根据当前的形势、为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方案,但是在提出方案的过程中都有个人生活环境、生活经历以及自身思想影响的因素,所以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就呈现出诸多不同之处。比如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依托,章太炎的思想有浓重的大乘佛学色彩以及庄子思想的影子,严复借助西方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精神构建其思想体系。在刘古愚的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了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张载开创的关学是刘古愚思想的底色。具体地说关学思想中经世致用的实学特点支持其思想不断转向现代化,实学思想是其新思想生长壮大的砧木。刘古愚既是关学精神的受惠者,又是关学本身发展环节中一位转折性人物,他将传统关学融进现代学术洪流之中。这是内地学者、思想家思想转型的一个独特案例。

第四,戊戌维新运动的陕西模式。目前学界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核心事件、核心地区及核心人物方面,对于地方维新运动关注不够。上海、湖南、天津等地的维新运动之所以长期以来受到关注,是因为这些地方是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离开这些地区,全国性的戊戌维新运动“大事件”的链条就不完整。相比较而言,与中枢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关系不太密切的陕西维新运动则被忽略。实际上,除了湖南、上海、天津以外,全国各地的维新变法活动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如山西、贵州等地在巡抚、学政等高级官员的推动下创办学堂,传播时务之学,维新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地区的思想变革、社会改革也在持续进行,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些地区称为“维新运动”的“次级地区”。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这样的“次级地区”绝不是不重要的地区,其事件也绝不是不重要的事件。就陕西而言,维新运动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与东南地区不同的特点,如地方士绅成为维新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关心经济问题,注重新式生产工具的推广和应用;以教育为主,尤其致力于基层县乡思想、风俗、文化的改进;具有突出的自发性和相对独立性,陕西“味经讲会”的成立比北京强学会还要早;注重民族问题,致力于通过文化融通、经济发展来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传统优秀学术文化的作用明显;等等。有鉴于此,我们在书中提出了“戊戌维新的陕西模式”,以表征陕西维新运动的个性特点。对各个省市的研究将推动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走向深化、细化,也会反过来推动对整个维新运动的认识走向深入。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概念也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

作为一部研究性的评传,我们在行文中坚持平实、客观的态度,首先是把事件交代清楚,把传主的思想客观地表述出来,尽量接近事情的本真;采取中立的研究态度,避免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成分掺杂其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任何的“转述”都已经对事情的本真有了一定的“疏离”,纯粹的